

美國史學界有關近代中國婦女史的研究 新趨勢*

許慧琦**

緒論

1999年7月31日，筆者由台灣飛往美國，展開為期半年的博士生短期研究，回國後欣聞《政大史粹》以近代史研究的新趨勢為主題進行邀稿，乃不揣簡陋，擬嘗試就筆者在這半年的觀察與認識為基礎，談談美國學界對於近代中國婦女史的著作與研究新趨勢，以就教於專家學者，促進意見交流。也由於留美華裔學者王政（Zheng Wang）曾著〈美國女性主義對中國婦女史研究的新角度〉（1995）一文，因此本文將把重點集中於討論近五年來的研究概況與走向。

美國學界對近代中國婦女史的研究，大體上始於1960年代末與1970年代初期，也就是美國本身婦運再現高潮之時刻。若簡要地歸納這數十年來其

* 感謝本文匿名評審委員的意見，謹此致謝。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



研究趨勢的演變，我們可以說有幾項特色：從對共產中國婦女解放的高度樂觀想像中回歸現實，並在中國大陸對外開放後逐步開發與收集各種一手史料；從 1980 年代西方開始盛行的後現代主義思潮中汲取反思的動力，質疑「普遍的婦女特性」(universal womanhood) 以及一元的西方中心主義，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因而被置於有關第三世界婦女史研究的大架構中，進行多元的新理解與新詮釋。¹近十數年來愈見發展的兩岸三地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也與美國學界的研究成果產生良性的互動與刺激；此可從不斷舉辦的相關學術研討會得知。²華人世界不斷蛻變中的政治與社會情勢，以及持續赴美留學的風氣，與美國學界探索近代中國婦女史的思考方向與討論議題亦不無關聯。以下筆者將以自身所能掌握的資訊，從美國多所大學歷史系教授的相關著作與研究計劃，以及博、碩士研究生的相關論文兩大部份著手，綜合歸納近幾年美國學界有關近代中國婦女史的研究趨勢，並於結論提出一己管見與期許。

另外需稍作解釋的是，事實上美國學界有關近代中國婦女文學史或從文學面向切入探討中國婦女與社會文化的著作，可謂相當豐富，且思考角度多元而活潑；但筆者因限於篇幅與所學，僅將本文內容較具體界定於史學著作中。

美國各大學教授相關研究簡介

以西岸一系列加州公立大學數所分校的歷史系為例，便有多位近代中國婦女史的知名學者。由加大戴維斯分校 (UC Davis) 的 Susan Mann 教授擔

¹ 參見王政，〈美國女性主義對中國婦女史研究的新角度〉，鮑曉蘭主編，《西方女性主義研究評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5)，頁259-275。

² 筆者本身便參與了1999年10月23、24日於UCLA召開之「廿世紀中國婦女與現代性」(Wome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學術研討會，並知悉2000年2月25、26日於Yale University舉辦了「女性形象，女性生活研究生討論會」(Female Images, Female Lives Graduate Student Conference)。



任編者的《在儒家眼底：東亞史中有關性別的文件》（*Under Confucian Eyes: Documents on Gender in East Asian History*, 2000）即將出版。加大洛城分校（UCLA）的 Kathrin Bernhardt 教授則在去年出版以長時段歷史為主題的《中國婦女與財產》（*Women and Property in China, 960-1949*, 1999）。加大河岸分校（UC Riverside）的 Lynda S. Bell 教授，其目前的研究方向包括 20 世紀的中國婦女、地方法庭與家庭法之間的關係。加大聖塔芭芭拉分校（UC Santa Barbara）的 Mark Elliott 教授在去年曾發表一篇〈清代中國的滿洲寡婦與種族〉（“Manchu Widows and Ethnicity in Qing China”, 1999），另一位 Joan Judge 教授的興趣多在 20 世紀早期中國婦女受教育與識字等文化問題；她從女子教科書出發，提供了有趣而引人注意的思考角度。她發表於《國際東方學者會議紀要》第 42 冊的文章〈國民或國民之母？：晚清女子教科書中的女性特質再想像〉（“Citizens or Mothers of Citizens?: Reimagining Femininity in Late Qing Women's Textbooks”, 1997）則為其例之一。

執教於加大聖塔庫斯分校（UC Santa Cruz）的 Gail B. Hershatter 教授則於 1996 年擔任《重繪中國：歷史地帶中的裂縫》（*Remapping China: Fissures in Historical Terrain*）的編者，並於 1997 年出版其名著《危險的逸樂：20 世紀上海的妓女與現代性》（*Dangerous Pleasures: Prostitutio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Century Shanghai*）。1998 年她又出版《中國婦女研究指南》（*Guide to Women's Studies in China*, 1998）；而去年底她在舉辦於 UCLA 的「20 世紀中國婦女與現代性」（Wome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October 23-24, 1999）學術研討會上發表的文章〈1950 年代鄉村中國的社會性別與「國家效應」〉（“Gender and the 'State Effect' in Rural 1950s China”），則是有關 1950 年代國家對婦女問題產生的作用與影響；Hershatter 教授大量蒐集並運用訪談等方式製造婦女史料的努力不懈態度，實令後輩佩服並生效尤之心。至於南加大（University of South California）的傅樂詩（Charlotte Furth）教授為研究中國醫學史與婦女史著作豐富的專家，其目前的關懷課題為婦女與中國現代性的領域。加大爾灣分校（UC Irvine）的 Hu Ying 教授近



年來的興趣集中於翻譯文學與晚清追求與想像現代性的關聯；其於「20 世紀中國婦女與現代性」研討會上發表的文章〈一位現代偶像：蘇菲亞及其他者〉（“A Modern Icon: Sophia and Her Others”），以及今年 3 月由 Stanford 大學出版的專著《譯話：構思中國新女性，1898-1918》（*Tales of Translation: Composing the New Woman in China, 1898-1918*），都對此一領域有相當具啟發性的觀點。

除此之外，東北大學（Northeastern University）的 Christina K. Gilmartin 教授以編著 1994 年出版的《性別化中國：婦女、文化與國家》（*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知名於台灣；1995 年她更擴充其於前書中對北伐時期婦女動員的政治文化之序論，寫成《啟動中國革命：1920 年代的激進婦女、共產黨政治與群眾運動》（*Engendering the Chinese Revolution: Radical Women, Communist Politics, and Mass Movements in the 1920s*）一書；去年她並為《民國時期的婦女：原典》（*Women in Republican China: a Sourcebook*）寫了一篇序論。她目前正在進行中的研究計劃，包括有關性別的跨學科研究，以及與中共女黨員王一知合作中的自傳性著作。

賓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 Matthew Sommer 教授於今年出版了《中華帝國末期的性、法律與社會》（*Sex, Law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的 Duara Prasenjit 教授曾於 1998 年 10 月於《歷史與理論》（*History and Theory*）期刊發表專文〈真實性的秩序：現代中國的超時間性、社會性別與民族史〉（“The Order of Authenticity: Timelessness, Gender and National History in Modern China”）。而長期以來致力於運用社會性別理論（gender theory）研究中國史的華聖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白露（Tani Barlow）教授，近年來的著作為 1997 年擔任編者的《東亞殖民現代性的形成》（*Formations of Colonial Modernity in East Asia*）。西卡羅來那大學（Western Carolina University）的 Gael N. Graham 教授，以其兼長於美國史與近代中國史的學識，寫作了《社會性別、文化與基督教：美國新教教會學校在中國，1880-1930》



(*Gender, Culture, and Christianity: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 Schools in China, 1880-1930*, 1995) 一書。另外，紐約大學 (New York University) 的 Rebecca Karl 教授所開授的「近代中國的性別與激進主義」(Gender and Radicalism in Modern China)，從包括民族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等激進思潮，如何由不同的社會、意識形態與政治等需求出發，對近代中國的性別議題進行思考與塑造其討論空間。

以上列舉的專家學者，雖不完整，但大體上代表了近五年來美國高等教育機構對近代中國婦女史的研究成果。至於即將或正加入學術界，以共同開發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的美國博士研究生，其表現亦不容忽視。以下部份筆者將以自身所知，略為介紹幾篇進行中或已完成並出版的博士論文或單篇專文。

美國博士研究生相關論文與著作

身為美國史學界新一代與生力軍的歷史所博士研究生，得益於數量不少的研討會以及赴海外作田野調查等獎學金的設置，且由於其身處「文化熔爐」的美國環境中，對研究近代中國婦女史的著重點與關懷層面，自然與台灣、大陸與香港三地的學生不盡相同。而於美國發展熱烈的女性主義研究與 1980 年代後規模漸盛的後現代、後殖民主義風潮，對其論文的思考與撰寫模式，亦不無影響。有關這群生力軍所參與並發表文章的學術研討會資訊，實非筆者能力所可及，因此謹舉一例述之。

今年 2 月 25 與 26 兩日於耶魯大學 (Yale University) 舉辦的「女性形象、女性生活研究生討論會」(Female Images, Female Lives Graduate Student Conference)，是一個提供研究亞洲女性經驗的學生進行意見交流的跨學科會議 (An Interdisciplinary Conference on the Female Experience in Asia)。會議論文共四十篇，有關近代中國婦女史的數篇文章，都集中於名為「晚清與民國時期婦女現代性的生活與辯論」(Living and Debating Women's Modernities in



the Late Qing and Republican China) 的場次裡。其中有三篇專文來自美國大學研究生，包括俄亥俄州立大學 (Ohio State University) Carol C. Chin 的〈中國女權主義者觀看西方：中國的女性雜誌與西方的影響，1905-1915〉 (“Chinese Feminists View the West: Chinese Women's Periodicals and Western Influence, 1905-1915”)，卡內基梅隆大學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Elizabeth A. Littell-Lamb 的〈走向大眾：YWCA 與金陵女子文理學院的中國領導階層與女權主義肇端，1919-1936〉 (“Going Public: Chinese Leadership and Feminist Initiatives in the YWCA and Jinling College, 1919-1936”)，以及曾於台灣《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發表過文章的台灣留學生、就讀於加大爾灣分校的連玲玲 (Ling-ling Lien) 所發表的〈論爭現代性：1930 年代中國的兩種「新女性」形象〉 (“Contesting Modernities: Two Visions of ‘New Woman’ in 1930’s China”)。

至於許多有關近代中國婦女史的碩、博士論文，則包括哥倫比亞大學 (Columbia University) Jian-mei Liu 的博士論文〈糾纏於革命與愛情：中國、性別角色與政治典範〉 (“Engaging with Revolution and Love: China, Gender roles and political norms”) ³ (1998)；南康乃迪克州立大學 (Southern Connecticut State University) 歷史所 Kelly McCreavy-Washburn 的碩士論文〈民國時期的中國女性，1900-1949〉 (“Chinese Women During The Nationalist Period in Chinese History, 1900-1949”) (1997)；太平洋路德大學 (Pacific Lutheran University) Wutzke Marie Janette 的碩士論文〈轉變中的婦女：革命中國時期對平等權的奮鬥，1900-1957〉 (“Women in Transition: The Struggle for Equal Rights in Revolutionary China, 1900-1957”) (1994) 等等。而前已提及曾撰〈美國女性主義對中國婦女史研究的新角度〉一文，而已畢業於加大戴維斯分校的學者王政，其博士論文《中國啟蒙運動中的婦女：口述與文本

³ 由於以下數篇論文為筆者於網路上蒐尋所獲之資訊，所以無法得知其中文名字，在此特別說明。



的歷史》(*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Oral and Textual Histories*) 則於 1999 年出版。此書的特色，在於作者於上海訪談了十數位（最後她選定五位）成長於五四時期的新女性，即當時所謂的職業婦女，將她們的成長奮鬥與心路歷程，與史料文本共同交織出近代中國女權主義的發展史。

新趨勢綜合分析

綜合以上簡要的介紹，我們可基本歸納出近年來美國學界有關近代中國婦女史的研究新趨勢：一為廣泛處理婦女與現代性的關係。近代中國自與西方文化愈漸深入的接觸與交流之後，加速了中國變動的因子；而現代性簡單地來說，便是具有「掃淨一切過去的，以期最終達至一個可以被稱為真正的現代的慾望」之所有特質。⁴現代性是一種過程，我們不應將之侷限性地與西化結合在一起。中國的現代性，基本上便是存在於近代知識份子之間那份渴望國家富強、民主自由、社會進步、經濟繁榮的強大動力，由此表現出要求改變、革命、進步，革除積弊與陋習，向更進步的國家與文化學習的實際行動成果。當筆者參與「20 世紀中國婦女與現代性」研討會時，與會學者幾乎一致認同「現代性」是一個複數 (*modernities*)，而非僅為單數 (*modernity*)；而 *negotiation* (可謂流通、折衝或協商) 則居間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亦即史學家處理世界的現代性所應仔細思考的問題。近代中國「女性」做為一種超越傳統親屬人倫的語彙範疇而存在，其本身的演變便象徵著中國想像現代性並進而創造與認同之的不斷嘗試。透過對此二者之間互動與關聯的探討，我們得以釐清中國婦女在傳統社會與不斷蛻變的近代世界中，如何被看待、界定與期許，同時也能由婦女持續嘗試建立自身主體性的過程中，瞭解中國現代性的特質與走向。Gail B. Hershatter 的《危險的逸樂：二十世紀上海的妓女與現代性》，王政的《中國啓蒙運動中的婦女：口述與文本的歷史》，以及連玲玲的〈論爭現代性：1930 年代中國的兩種「新女性」形象〉等，都是此

⁴ 見周蕾，《婦女與中國現代性：東西方之間閱讀記》(台北：麥田，1995)，頁171。



趨勢的例證。其中王政曾於其書中表示「[中國]以西方術語或仿效西方婦運的模式進行女權運動，主要呈現了五四新文化運動者追求現代性的急切渴望。」(Zheng Wang, p. 50)

其次，是對女性形象的多樣性研究。筆者曾蒐集國內過去有關女性形象研究的碩士論文，其中多以中文所為主⁵；其較拘泥於傳統的形象理論或純粹的文本分析。美國學界對女性形象的研究，自然不限於史學界，但就上述所臚列的史學著作來看，便可發現如 Hu Ying 的〈現代偶像：蘇菲亞及其他者〉(“A Modern Icon: Sophia and Her Others”)，以及《譯話：構思中國新女性，1898-1918》，採取的是跨文化(cross-cultural)觀看中國的態度，思索在中外文化頻繁交流的歷史階段裡，中、西方女性形象如何被塑造、呈現，及其所代表的意涵。Hu Ying 運用的主要是各式各樣的翻譯素材，而 Joan Judge 的〈國民或國民之母？：晚清女子教科書中的女性特質再想像〉則從教科書出發，討論其中的女性特質，呈現出清末想像與期許「新女性」的情境。

另一種新趨勢則是從世界史或區域史的視野來研究、比較婦女史。近代中國史本就是一部不斷與外國文化與勢力互動而演變的歷史，身處此時期且與社會國家關係愈見複雜多元的中國婦女，自然不可能完全置身於外國種種影響之外；因此擴大近代中國婦女史的眼界，亦為勢所必需。從曼素恩收納中國、日本與韓國有關儒教與性別關係的各類文本所編的《在儒家眼底：東亞史中有關性別的文件》，Gail Hershatter 所編的《重繪中國：歷史地帶中的裂縫》，到白露所編的《東亞殖民現代性的形成》，她們所關注的，無非是希冀為研究近代中國史與婦女史注入新活力，使其廣度與深度都能進一步有所發展。

⁵ 例如林春菊，〈歌仔戲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所反映的臺灣社會：以本地歌仔戲〈山伯英台〉〈呂蒙正〉為例〉，國立中興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87年；黃蘊綠，〈明末清初才子佳人小說中的佳人形象〉，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民國86年；周正娟，〈《聊齋誌異》婦女形象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民國84年；賴珮如，〈《花間集》的女性形象研究〉，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民國86年；李孟君，〈唐詩中的女性形象研究〉，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民國81年。



結論：期望建立東西方更活潑的對話

以上扼要報告了筆者對近年來美國學者研究近代中國婦女史趨勢的部份理解與掌握，接下來想談談筆者赴美半年所見親歷的感想。

筆者在美國進行短期研究時，隸屬於紐澤西大學羅格斯分校(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的婦女研究中心(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Women)，除受益於當地指導教授高彥頤(Dorothy Karl)的協助與觀點刺激良多之外，更在其推薦下，有幸參與上述提及於UCLA舉行的「廿世紀中國婦女與現代性」(Women and Modernity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學術研討會，並於其中發表生平第一篇英文論文〈「娜拉」在中國：現代性與游移的性別認同〉(“‘Nora’ in China: Modernity and Traveling Gender Identities”)，並於會中聆聽包括Joan Judge、Duara Prasenjit、Kathrin Bernhardt、Hu Ying、Gail Hershatter、孟悅等多位專家學者的高見，深感當地研究中國婦女史的熱絡氣氛與思考模式的活潑與多樣化。筆者初次以英語發表並接受問題，緊張之情自可想像；但會中所有學者都非常友善且客氣地表達其意見，不但抒解了筆者原有的焦慮，更深感受益良多。記得當初寫作這篇會議論文時，曾向高教授請教，她告知筆者：「美國史學界多半不甚重視你是否在這篇文章中得出某一具體的結論，他們更有興趣的，是你是否提出什麼新的問題與思考角度」。短短數言，可謂一語中的地指出美國學術界的研究特色：不斷追求新嘗試，不斷與世界各地學者交換研究觀點與最新資訊。當然美國史學界有其長處，也有待加強之處；如何不僅以源自西方的種種解釋理論來觀察與分析中國婦女的處境、角色及其與社會家國的關係，如何更精準地掌握、運用、開發以及解釋中文史料，以及如何透過新觀點的開發，使近代中國婦女史與其他史學領域，或其他學科間的交流，得以產生更具建設性的對話；這些都是不論美國史學界，更是台灣史學界可自我期許之處。

除此之外，筆者認為台灣大專院校的歷史研究生應多有作文化交流的心態與準備；事實上不論自身研究屬於哪一領域，出國見識，增長見聞，不論



在學識或生活視野上，都會有一定的收穫。就筆者所知，許多美國大學歷史研究所或其他許多基金會，多有設置獎學金以供學生赴海外作半年至一年的田野調查或交換學生的政策，這對研究生們赴海外學習自然有一定程度的鼓舞與支持作用。台灣其實也有不少資助赴大陸、日本或歐美的獎學金設置，希望各位研究生能多加利用，共同促進地球村的學術交流。

放眼廿一世紀，「地球村」的意涵將更加落實於每一個領域，包括學術界的彼此交流與史學的研究範疇；筆者期望台灣史學界能經由多元化的管道（網際網路、參與國際學術會議、出國進修訪問、短期研究……），充份掌握國際學術的脈動，增進彼此間文化的交流與認識，不僅能建立東西方更為活潑的學術對話，更可能使「歷史」真正發揮點通古今、也通中西之變的效用。

